

+ DIWIECZOREK

CINA

慈多會傳教士

韋助力神父

小傳

香港

1982

OMAGGIO

慈 幼 會 傳 教 士

韋 助 力 神 父

(Don Teodoro Wieczorek)

dm.
Rang

小 傳

香 港

1982

恩格斯肖像



慈幼會傳教士韋助力神父

(DON TEODORO WIECZOREK) 小傳

出生及青年期

韋助力於一八八八年，在波蘭 Polonia 枚彌助省 Gniezno 的波波和依那這和 Popovo Ignacewo 村出生。我們缺乏他少年時期的資料，只知道他在一九〇七年，十八歲時，於達沙華 Daszawa 的慈幼會學校攻讀中學，一九一〇至一九一一年間，在黎達那 Radna 修院備修，翌年在那裏入初學，一九一三年八月十五日，他發了初願及開始讀哲學；可惜，因戰爭的關係而中斷了他的學業。

在克拉科夫 Cracovia 車站

後來，他被徵服兵役充當德國士兵（波蘭那時尚未統一）。有一天，助力和他的同伴在克拉科夫車站，候車上戰場，突然間他想起忘記了一件要緊的東西，便立即回去携取，及至重回車站時，軍車已遠去了。

助力發覺沒有人理會他，同時又不知該到何處和做些什麼？他想最好的就是回家。

農夫

那時，他的哥哥當了兵，所以他能幫助家人在田間工作，幸好沒有因為是逃兵，而再被人拉上戰場。他希望可以留在家中直至戰爭結束，可惜事與願違；兩年後，他又被徵當紅十字兵，被派去羅馬尼亞 Romania 服役。

聖母救助力的生命

在羅馬尼亞，他天天在軍醫院中工作，但因衛生設備很差，該「醫院」就成為「死院」。另外，他在夜間也會被派往守衛黑海 Mar Nero 海岸，因為海岸內藏有很多黃金，那是德國準備借給土耳其 Turchia。

在助力當兵的地方，忽然傷寒病很流行，在二百兵士中，生存的只有十七個，助力是其中之一；他熱愛和依賴聖母，聖母保護了他。

回 國

德軍戰敗時，助力正在敖德薩 Odessa，他即投入新成立的波蘭軍隊，和他們一同步行參與對俄國 Russia 紅軍的戰鬥；最後，才能返回波蘭。

修 士

軍隊解散後，助力希望儘快恢復修會的生活。慈幼會士返回波蘭，他立即往見會長狄良 Don Tirone 神父，會長叫他到義大利 Italia 科利佐 Foglizzo 神學院研讀神學；在那裏讀了兩年神學後，至一九二〇年六月廿八日，他發了永願。

值得記憶的傳教士出發

從一九〇六至一九二一年間，很多慈幼會傳教士前來中華區，但其中只有神父和修士，從未有修生；至一九二一年，才有四位修生前來，而韋助力便是其中之一。其他三位是：紀勵志 Kerec Giuseppe、包含妙 Pamio Aurelio 和堅善美 Kirschner Antonio。

司鐸和傳教士

韋助力和紀勵志於一九二三年五月廿六日晉升鐸品，

他們隨即到香山縣傳教。當時香山縣（今中山縣）傳教分區，是澳門主教委托給慈幼會主持。

在香山縣傳教不是容易的，香山大路很少，河流多，教友少，但土匪却特別多，但韋神父從不害怕。他爲了幫助他人，有時做醫生、有時做教師、及時常講授道理；實實在在爲他的教民，他是真正的「神父」。

他原是居住在小欖的，但教友分散之故，並又要管理石岐、香山縣城的教務，故須步行前往各地居留。

他救了縣長的命

軍閥時代，中國國內常有內戰，當某派系得勝，動輒在所侵佔的地方肆行劫掠、報仇、無所不爲。

有一天，一個敵派侵入石岐，縣長爲了逃命，急忙跑入天主堂避難；此事對神父也極危險，但韋神父不懼怕，即叫縣長躲入一小房間內，搬移一個大櫃遮蔽房門，使外人不易察覺；不多時，一隊兵士追來，他們說：「神父，縣長在這裏，快叫他出來。」韋神父答道：「這裏沒有縣長，請你們自己查看。」兵士們搜查時，神父心內祈禱；兵士看不到大櫃後的房門，便對神父說：「神父，對不起，我們麻煩了你。」隨後就撤走了。不久，該敵派失敗，縣長恢復職位，他時常記着韋神父救命之恩。

通行証的價值

一九二五年，在上海和廣州發生了流血事件，因此有十萬工人離開香港和澳門返回廣州。對香港、澳門絕交，船車不通，生意全部停頓。

因國內不安定，耿其光 D. Ignazio Canazei 會長命在河西的初學生前來澳門。七月廿四日，初學師和初學

生南下，他們到達廣州時已是黑夜。出車站後，他們即到岸邊，那裏有一位女教友在等候；她冒險地用自己的小艇載他們至石岐的渡船上，船伕叫他們躲入艙內，避免給人發現。

翌日開船，過了數小時後才抵達石岐，韋神父特前來迎接他們；第二天，和他們一起上船到前山（因為絕交一事，致令沒有船到澳門）。

那時，要去澳門的人，該有特別的通行証。韋神父因得縣長幫忙，領得特別通行証，故能常出入澳門，但其他的初學生却没有什麼証件，爲了這緣故，韋神父便避過檢查站，帶領他們由田中小路向澳門的關閘出發。行程中，給人發現了，一班拿着竹竿的人，圍着他們，怒氣充充的說不可通行。神父說：「我有通行証。」但他們却說：有通行証，該到檢查站。他們粗聲說，神父大聲講，正是公說公有理，婆說婆有理；爭持間，最後來了一位先生，很有禮貌地問發生什麼事？韋神父說明來意，但檢查証件的官員說：「你們這麼多人，只得一張通行証，怎能全部通過，但爲了避免發生其它的事，姑准你們經關閘到澳門。」

我想，大概因韋神父是石岐縣縣長的好朋友，所以能獲通融吧！

小欖寄宿學校

韋神父在探訪教友時，發覺他們的道理程度敷淺，他想到最好的方法，是教導他們的青年；但在香山縣，是沒有天主教辦的學校，雖然有些青年前去澳門慈幼學校接受教育，但該校是職業學校，對來自農村而來的他們，在澳門學了革履、木工、縫紉等技能後，又不肯回鄉重操故技。

韋神父希望開設一間短期性學校，幫助他們學習道理及經文。爲實現這個計劃，那是要金錢上的支持，後來，韋神父由波蘭的恩人處得到了這款項。他遂在天主堂的空地上蓋搭了一座大竹棚；理想達成，但還缺少一管理員，韋神父就請求會長派一位會士來負責。那時剛好在澳門的學校，有一位德籍修生，他一面管理學生，一面學習中文和義文；但有時他不懂長上的義文，又不明學生的中文，內心感到很難過。耿會長把握這機會，叫他前去幫助韋神父，因韋神父會說德文，所以他們兩人合作愉快。那位修生在小欖小學得到很多經驗，使他日後能成爲一個很好的傳教士。

小欖學校常有學生免費的居住在那裏數月之久，回家時，就明白了聖教要理，還學會了妥當的領聖事，不單了解經文，也學會輔彌撒。

慈幼會士退出香山

一九一一年，澳門主教包連 Mons. Paolino 和雷鳴道 D. Luigi Versiglia 定下合約，委托香山教務給慈幼會。內容說：「此合約爲期七年，期滿後，若不廢除，即作爲延期論。」這樣，直至一九一八年，展期了一次；但到了一九二五年，耿會長得到了總會長李納德神父的准許，請澳門高主教 Mgr. J. da Costa Nunes 修改該合約的條文。這條文當中，最重要的兩項是：一、合約該是長期的；二、傳教士該有六人。但高主教的意思不同，他說四位傳教士已足夠了，而又不想定下長期的合約，害怕將來自己的承繼者不滿。爲了這件事，雙方雖有繼續交談及書信往還，但至一九二七年還未有決定。

那時，澳門政府想伸展葡國的勢力至附近的香山縣，遂催促澳門主教叫葡國傳教士到那裏傳教；而慈幼會士因不是葡籍的，所以主教想調肇慶葡籍的耶穌會神父，前來代替他們。

因此，主教遂對耿會長說，他可給予慈幼會在恩平和開平兩縣傳教，及訂立一項長期的合約。

一九二七年，慈幼會副總會長李嘉堂神父到了中華區視察，所以他明瞭香山的問題。當耿會長通知他有關澳門主教的建議後，他即用電報回覆說：我們決定退出香山。

慈幼會遂於一九二八年復活節，把香山的教務，移交給耶穌會會士。

韋神父返波蘭

一位傳教士只在遠東服務七年就回國，在那時代是一件非尋常的事，但韋神父此行並非去渡假，而是尋求他的恩人捐款為幫助貧窮慈幼會中華區。

韋神父離開香港時是一九二八年二月廿四日，會見了波蘭和僑居美國的波蘭僑民捐款，至一九二九年十月十一日，才返回香港。

會區財務長

韋神父回港後，會長給了他財務的重任，他負任（與其他的責任）直至一九五二年。

在遠東，其他的修會也有他們的財務長；他們的責任是管理該會的財產，並運用盈利給予他們的傳教士，作為傳教的經費。

慈幼會的財務長則不然，名義上是一樣，責任則大不同：他沒有管理財產的責任，因為慈幼會沒有財產；他的

工作是請求天主照顧的代表——「恩人」，而明智地分配所得。這是很艱難的工作，但韋神父能夠使會友稱心滿意。

擔任神師

在那幾年，他當了神師，在數間學校和香港修院服務，再沒有肩負財務長之職；由一九五二年至逝世前，仍在香港仔工業學校充當神師。

歷史不能描述他怎樣幫助了很多人的靈魂，但他的功勞會被紀錄於他的生命冊上。

聖安多尼堂主任司鐸

初時，香港西營盤教堂，不是一個正式堂區，只是一間為葡僑和幾個華籍教友而設的小堂。葡僑曾於現今「英皇書院」的現址，興建了一間小聖安多尼堂，在香港政府需興建該書院時而遭拆卸。教友在主日，只好前去聖類斯學校小堂望彌撒；堂內祭台邊有一尊聖安多尼像，那是從舊堂搬移過來的。

慈幼會在接辦聖類斯學校時，有一附屬條件：是要建造一間正式的聖安多尼堂。那時聖堂未能即時興建，所以教友和學生只得用學校地下底層的小而暗的聖堂，以後轉到二樓一間比較大的房子。一九四五年，本堂區成立了，至一九五三年，新的安多尼堂正式揭幕。韋神父在多年困難之中，管理他的教友，並得到他們的信心和敬愛。

投火救人

在聖類斯學校的西方，有三個很大的煤氣鼓，頗接近民居。一九三四年五月十四日，有些煤氣漏出，乘着猛烈北風吹到煤氣鼓南方的樓房，致令煤氣爆炸着火，火勢急速蔓延，火焰四散。

聖類斯學校的會士，眼見形勢危殆，忙令學生火速回家，並立即趕赴火場救人；他們拆除所有的鐵絲網，使災民易於逃走。韋神父更不只助人逃生，自己還冒險投入火海中，救出幾個陷於死亡邊緣的人，使他們免被燒死。當日災情慘重：傷亡者達二十八人，受傷者一百五十人，並有六十人失蹤。

校長

一九三四年，慈幼會開辦了香港仔工業學校，聖類斯學校校長金以義 Don Bernardini 神父榮任新校長之職，因此韋神父成為聖類斯學校校長，至一九三六年三月廿八日，他前去歐洲，尋找必須的救助。

戰爭期間

一九四〇年，因為義大利和德國向英國宣戰，故在聖類斯和香港仔學校的義籍和德籍會士均被軟禁，後被扣留在赤柱，七月份才獲准去上海和澳門。

該段時期，在聖類斯學校還有溫普仁 Don Guarona 神父和務嘉韜 Don Boccassino 神父；雖然他們是義國人，但香港政府明知他們不是敵人，故未遭軟禁。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，日本軍隊開始進攻香港，「敵」國人民又被拘留；聖類斯校長溫神父有見及此，故儘快把學校交給韋神父，使他負責校務。

此時，聖類斯和香港仔學校被徵用，學生火速回家，但有不少無家可回者，集中在聖類斯，兩天後，又被遷至北角的難民營。

過了幾天，日軍侵佔了九龍半島，並從那裏不斷炮轟香港。北角的難民營發覺有危險，要遷去太古谷內臨時蓋

搭的難民營；但不久，那個地方又受到炮彈轟擊，所以他們又要尋覓居處。香港仔的學生希望返回他們的學校，但因交通困難，只能到達筲箕灣修院；聖類斯的學生，也只好寄居於赤柱的瑪利諾 Maryknoll 會院。聖誕節時，日軍到那裏拘拿他們的長上和其他的外籍人士，更迫令學生幫助抬傷兵及埋死屍後，才放他們離去。他們衣衫不整，在極度疲倦和飢餓底下返回學校，韋神父歡迎、安慰和幫助他們。

在日本統治下的香港

一九四一年聖誕節，日軍攻佔香港。十二月底，義、德籍的會士被釋放，但英國、愛爾蘭和荷蘭籍會士則被拘留。

五月，溫神父得恩理覺 Mgr. Valtorta 主教的幫助，使杜希賢 Bern. Tohill 修生和賀其義 W. Haughey 神父獲得釋放；杜修生因為是愛爾蘭人，而日軍也誤信賀神父亦是愛爾蘭籍，故一同獲釋（賀神父原籍蘇格蘭，但他却不說出因由解釋他們的誤會）。他即返回香港仔，因他是該校校長，但他明智地令他的副校長，即波蘭籍的繆仲素 M.Mielczarek 神父，代為辦理一切有關校方與日軍的事項。

因着國際紅十字會的幫助，稍後荷蘭籍的祁志堯神父 G.Clifford 和羅志賢 G.Roozen 神父亦被釋放，便即前去上海；幾個月後，蘇格蘭籍的施彌德 A. Smith 修生也被釋了。拘留在赤柱的還有兩位修士：即馬爾他籍的封義士 L.Bonnici 和澳大利籍的經利泉 F.Grimshow，他們在戰後才被釋放，其後返回本國。

一九四二年正月，聖類斯學生返回原校，香港仔的學生也同樣的回去，只留下幾個仍在筲箕灣修院修理院舍。幾個月後，上列兩校方能勉強復課，期間雖遭遇到不少困難（香港仔學校一半校舍被日軍徵用），會士們的忍耐，把所遇到的事都徵服了。

溫神父後來還派了二十個最年幼的學生，到筲箕灣成立一小分校，以後那分校獨立了，遂漸漸成為現在的慈幼學校。

當時，香港的情況很悲慘，食物價格非常昂貴，學生每日只能吃一碗粥、一碗飯和小量的餸菜，這是採摘自他們自己種植在學校對面菜地上的，他們天天上山斬柴以作燃料；長上每餐只能吃一小碗飯和些少餸菜，每每有進餐房時肚餓，出餐房時還感肚空，韋神父有時還把自己的一份飯餸，分些給二十歲的年青伙伴杜修生哩！

慈善的撒瑪黎雅人

在聖類斯學校對面，有幾間空置的房子，在那裏聚集了不少乞丐，他們滿身傷痕和瘡癩。韋神父為他們成立了一個特殊的診療所，他更天天花上幾小時到那裏為他們洗濯和包紮傷口及贈送藥物；眼見有些已是無藥可治者，肉身雖無可挽回，但為了要救其靈魂，神父便努力教他聖教要理，替他領洗，以給他們永生。

戰爭平定

一九四五年，戰事完了，英軍反回香港，生活漸趨正常。韋神父繼續他的牧民工作，他感到建築一座新的聖堂是當前急務。奈於建築款項不足，而且他更患上「搖動痲痺」，故他決定到美國一行，一方面向美國的波蘭僑民要求捐款幫助，另外也趁機醫治本身的疾病。

一九五二年正月，他辭退了財務長和本堂主任之職，到香港仔工業學校當神師。

他的晚年

在香港仔的韋神父，繼續寫信給他的恩人，並盡力跟隨團體生活。後來，他的病情日漸惡化，行動不便，不能離開房間，更時常多次問人：「今天是否星期六？」會士們奇怪地反問他為什麼這樣注意星期六，他答道：「因為那日天神會來。」

不知這是他的預感還只是他的希望，在聖母的日子，他安祥地去世。

其實，聖母在她領報節日，囑咐天神來迎接他的靈魂到天主處，那是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五日。

他享年六十九歲，其間他盡了三十四年司鐸的生活，完全為光榮天主和救助無數人的靈魂。

